

长三角地区国内移民的总效果 及对区域城市结构的影响

任 远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国内移民有两种形式, 第一是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地区外部的相互移民, 第二是长三角地区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移民, 在此基础上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状况和演变。研究表明,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正逐步强化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为核心的5个城市组团, 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结构的未来演化做了初步分析, 对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区域移民政策提出一些分析思考。

【关键词】长三角; 国内移民; 城市别总计净迁移率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29X(2007)06-0003-06

【收稿日期】 2007-03-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空间协调发展研究 (05JJD79003)

本研究得到日本东亚发展研究中心 (ICSEAD) 访问学者的部分资助

【作者简介】 任 远 (1972-), 男, 江苏丹阳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

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 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所辖的16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对长三角地区人口空间动态研究的操作定义。

长三角是国家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枢纽性地区, 是国际资本投资主体性地区和制造业基地, 也是长江流域内贸易的核心地区, 这些都决定了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长三角地区面积10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总面积的1.1%。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6.3%。GDP总量超过全国的1/5, 人均GDP为4000美元, 是全国平均值的3.3倍。其中上海的GDP超过8千亿美元, 占全国之首。区域经济的率先发展, 使长三角地区显示出了与国内其他区域不同的人口特征和结构变化。

首先,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域。虽然2000年的户籍人口统计只有8050万, 但是同一时期的常住人口达到了8740万^①。其中, 47.5%人口分布在江苏省东南部, 44.7%分布在浙

江东北部, 18.8%居住在上海。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97人, 是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6倍。上海的人口密度更高, 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588人, 几乎是全国均值的20倍。

其次, 长三角地区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 就基本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 低死亡, 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上海则更早, 在70年代就已经实现。而在全国范围内是在90年代完成这一转变的。长三角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自然增长率几乎实现零增长。

第三, 长三角在我国经历最早、最高和最快的老龄化。区域内的老龄化水平达到了9.94%, 超出了全国平均7%的水平。而上海市的这一数据则更高, 达到了11.4%。通过人口金字塔, 我们可以看到底层的人群因为新生儿的减少而缩小, 上层人群则因为寿命的延长而扩大。据估测, 长三角地区将在2020年迎来老龄化的高峰, 将比全国领先10年。同时, 长三角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 之后会开始下降, 这一过程将比全

^①根据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有显著区别, 常住人口是在某个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国范围内的劳动力结构转变领先 8 年。

除了上海是个例外,长三角的其他城市都呈现出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反向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老龄化水平普遍低于长三角 10% 的平均水平,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和宁波。而相对发展较慢,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城市,比如南通、泰州,老龄化水平则超过了长三角的均值。这充分反映了替代性迁移对区域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影响,即年轻的劳动力迁入补充了劳动年龄人口,减缓了老龄化。

第四,长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积聚能力相对较高,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了 6.03%,高于全国的 3.88%。上海更是高达 11.84%。从高学历人群的分布来看,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和两个省会南京、杭州共吸引了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 61.3%,研究生以上高学历人口的 92%。拥有大量技术密集型劳动力是长三角地区表现出的一个比较优势。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些高速发展的城市,比如苏州和宁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技术型劳动力和高学历人才短缺的不平衡状态,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产业升级能力。

第五,长三角的工业化水平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全国经济活动人口中农林牧副渔产业的劳动力比率是 64.4%,而长三角是 31.2%。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率是 41.1%,高于全国 16.8% 的水平。服务业和商业部门的数字是 27.7%,也高于全国的 18.8%。长三角地区内部也基本存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序列。第一层次是台州、泰州和南通,主要以农业和渔业部门为主。第二层次的城市是绍兴、嘉兴、镇江,其制造业和工业部门高于农业和渔业,但低于服务业和商业。第三层次的城市是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和商业比重高于农业和渔业。经济结构层次最高的层次是上海和南京,服务业和商业部门高于制造和工业部门,而农业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这些经济空间结构的区别同样也决定了长三角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的总量和程度的不同。

第六,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领先全国。相对于全国 36.22% 的城市化水平,长三角的这一指标达到了 57.84%。其中,上海最高,为 88.31%;南京次之,为 71%;接着为苏州、无锡、杭州,在 50—60% 之间;扬州、泰州、湖州、嘉兴都在 40—50%;南通最低,大约为 34%。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别,反映了长三

角地区内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人口迁移的形式和区域性城市群的发展

1. 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长三角地区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自然增长几乎实现零增长。因此迁移是长三角地区人口变动的核心因素。迁移对该地区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城市体系的变动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伴随着产业的空间布局、投资和物流的发展,人口迁移成为区域中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演化。

替代性迁移具有加强劳动力供给、减缓地区老龄化的积极作用。^[1] 沈君丽^[2] 结合中国国情提出,迁移是在目前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下收获人口红利的最有效机制,它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减缓了城市老龄化,并延长了机会窗口(机会窗口是一个类似于人口红利的概念)。

王桂新和沈建法(2001)在上海地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对于本地市场有补缺和替代的双重效果,任远和王桂新的定量研究(2003)^[3] 也发现,总体来说,人口迁移对东部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人口迁移本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迁移者的教育程度一般高于迁出地的其他人群,朱宝树(2005)^[4] 研究了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除了上海、无锡和常州,迁移者的教育程度也高于长三角的本地城市。因而,迁移对于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教育程度有正面效应。从长三角以外地区迁入的移民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地区内各城市间的迁移则削弱了人力资本的差异性,起到了一种区域内部的“稀释”作用。

对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和区域发展研究表明,迁移是区域产业发展的结果和产物,并对地区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它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区域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繁荣、城市化的推进和城市结构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迁移也给长三角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事务带来了严重的压力。

2. 迁移的形式和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Newling(1966)^[5] 发现随着城市化程度加强,城市人口空间

分布的负指数曲线会下降,并过渡为二次负指数曲线,从而揭示了城市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的相对变化。Klassen(1981)^[6]提出了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在此以后会出现人口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进程。而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心城区的重建和更新,出现了人口重新回归城市的二次城市化现象。^[7]同时,Mollenkopf(1991)对纽约的案例研究指出,伴随着中心城区贵族化和富人重回中心城区,也出现低收入人群向城市外的迁移。这也说明在一个大城市地区,人口向内迁移和向外迁移可能同时出现和同时发生,并强化或者改变城市的空间性的阶层结构。

Hall(1984)^[8]则关注在更广泛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他研究的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在主要城市、一般城市和城市以外地区之间的迁移模式。城市体系内人口迁移的方向和各城市的发展,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决定了整个城市系统的形态和变迁。区域内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往往落后于主要城市。而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城市化程度、不同的产业选择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弱也不同,从而使城市群内的人口空间迁移模式显得更加复杂。

如果我们从区域城市体系的角度来研究人口迁移和区域发展,会发现不同形式的国内移民(乡乡迁移、乡城迁移、城市之间的迁移,及城市往农村的迁移)和国际移民(永久移民、国际劳工、难民、非法移民)总是同时存在的。在长三角地区,有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有一个城市向其他城市的移民,有城市之间的迁出和迁入,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流构成复杂的人口迁移网络。一些城市可能处于人口向市中心积聚的阶段,另一些则经历着深度的产业调整和人口向郊区迁移。这些人口迁移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不同城市的现状和发展。

虽然长三角的国外投资发展很快,但外国劳动力就业仍然是非常微弱的,国际移民基本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上海这样相当国际化的城市,长期居住的国外人口也只有0.6%,明显低于主要国际都市。本文将讨论两种主要的国内移民形式。第一,是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以外地区的移民,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这是决定长三角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是长三角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这是由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地位决定的。本研究将定量地分析这两种形式的国内人口

迁移是如何影响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布,及影响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化。

三、数据来源

对于人口迁移有两套不同的定义。一种是建立在户籍统计基础上的户籍人口迁移,一种是建立在人口居住时间统计基础上的常住人口的迁移。我们能够从年鉴上得到户籍人口迁移的数据,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这一数字比用居住时间测算的真实迁移水平要低很多,有时甚至会导致出一些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任远和王桂新(2004)对上海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用户籍人口迁移来衡量,几乎看不到迁移和经济增长的显著关系,而如果我们用常住人口迁移的数据建模型,就会发现劳动力特别是外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性关系。在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和迁移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尤其是75%的流动人口实际上是长期居留着的常住人口,因为用基于户籍人口的迁移数据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用常住人口迁移的概念来分析人口迁移和区域发展,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定义,常住人口的迁移是指在调查地居住超过半年,和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超过半年的人口群体,而不考虑他们的户口归属。下文使用的都是这个定义。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0.095%抽样数据库。同时,对于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城市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是从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汇编的相应数据整理而得(2002)。

四、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人口迁移的形式和程度

1. 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以外的人口迁入和迁出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的重要人口聚集地区,但是长三角以外人口迁入长三角,在不同城市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1)上海拥有最多的长三角以外地区的迁入者,占了总量的29.4%,人口中外来移民的比例也最高。这表明,进入长三角地区的移民更愿意进入上海。

(2)上海、苏州、宁波、杭州、无锡是迁入人口总量的前五名,共占有了长三角以外迁入人口的65.6%。

(3)台州、南通是长三角地区向外迁移的两个重要城市。上海和杭州也有较高的人口迁出,而上海的人口基数较大,所以迁出率较低。

(4)对于每个城市而言,从长三角以外的迁入人口都大于往长三角以外的迁出人口。这些城市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种城市的迁入率高、迁出率相对较低,这表明这些城市更多是长三角以外地区迁入者的目的地,这些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浙江的宁波、杭州。可以发现这些城市是典型地沿铁路线分布的。第二种城市迁入率低,迁出率高,包括南通、泰州、扬州、绍兴和舟山,它们都处于长三角的边缘地区。第三种城市的迁出和迁入率都很高,最典型的是台州。这表明,台州是周边地区的中转站,它扩大了长三角的经济影响力。第四种城市的迁出和迁入率都较低,包括嘉兴、湖州和镇江,它们是长三角内部地方性程度较深的城市。

2. 长三角内部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

通过观察长三角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迁移矩阵,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城市。第一种城市的净迁入率为正,比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和嘉兴,其中,上海最典型,有很高的迁入率和很低的迁出率,这也就再次证明了上海在长三角的中心地位。另外,嘉兴相对而言迁入率已经很低,但迁出率更低,所以也成为了净迁入为正的城。第二种城市净迁移率为负,比如台州、绍兴、南通、湖州、泰州、镇江、常州和舟山,相对迁入率较低,迁出率较高。

无论从城际人口迁移的总量还是程度进行分析,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和苏州都是长三角内部前五位的迁入地。南京的人口迁入率甚至高于上海。

区域内城市间的人口迁移是区域城市体系重新构造的重要因素。很多城市将上海作为迁入的首选或次选,尤其是南通、台州、绍兴和泰州,这表明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区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南京对于镇江、常州、南通和扬州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表明它是省内迁移的核心。杭州亦然,它对湖州、嘉兴、绍兴有很强的吸引力。苏州目前对于南通、泰州、无锡有着不断增强的吸引力,甚至无锡与苏州之间的迁移比无锡与南京之间的迁移还要多。同时,宁波对于台州和绍兴有很重要的积聚作用。这些特点显示,以上述五个城市为核心的五个城市组团在长三角内部慢慢形成,其中,上海是领头羊,

南京和杭州是两个重要的区域内副中心城市,苏州和宁波是新兴的副中心城市。

3. 国内人口迁移的总效果及对不同城市的影响

综合考虑长三角与长三角以外地区、以及长三角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对长三角各城市别的人口迁移率进行综合的测算。可以将所有城市分成三个主要类型。

首先,通过考察城市别的总计净迁移率,可以把那些迁移率超过 1% 的城市定义为“人口快速积聚的移民中心城市”,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南京、常州和嘉兴。这些城市一般都有较高的从长三角以外地区和从长三角内部城市的迁入率,较低的人口迁出率。

第二类是一些城市处于“人口净减少状态的城市”,包括南通、泰州、扬州、舟山。这些城市从长三角以外地区的人口迁入率、从长三角内部城市的人口迁入率都较低,而向长三角内部其他城市的迁出则相对较高(除了镇江和泰州),另外向长三角以外地区的人口迁出率也很高。这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滞后,并有持续落后的趋势。

第三类城市可以被认为是一些“人口微弱增长的城市”,包括镇江、绍兴、湖州和台州。这些城市从长三角以外地区迁入率,和长三角内部城市间的迁入率都相对较低。这些城市都受到长三角地区其他工业中心城市很强的辐射。这些城市实际上正好处在两个大型工业城市的“断裂点”上,比如镇江、绍兴、湖州,结合工业经济的“中心—辐射”的发展模式,这一尴尬的区位相当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速度。

五、对长三角地区未来人口增长和城市结构变化的预测

城市别的总计人口净迁移向我们展现了国内移民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的不同影响,也是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人口平衡公式,人口的变化是自然增长和净迁移的综合结果,我们用以下公式对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的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一个预测。

$$P_{t+1j} = P_{tj} * (1 + NIR_{tj}) * (1 + USINMR_{tj})$$

P_{tj} 为“ t 城市在“ t 时点的人口数; NIR 为城市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USINMR$ 为城市别的总计人口净迁移率。

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的重要制造业基地,人口将继续保持快速集聚的趋势。到2010年,长三角地区的总人口基本会达到约1亿人。

长三角地区人口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城市体系内部的结构将会进一步得到构造。长三角城市群将进一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其他杭州、苏州、南京、宁波另外四个都市区为载体的五个城市组团的格局。上海的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大约2千万。同时,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地区的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10年基本上都会实现800万人口左右的大城市地区。到2010年,这五个都市区将占长三角总人口的52%,而目前这一比例是48%。以这五个都市区为核心的五个城市组团,将对工业化和人口集聚发挥更大作用,将基本架构未来的长三角城市体系。

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口预测总是基于当前人口动态格局下的趋势性预测和可能性的预测,区域未来的人口发展将同时受到经济增长、产业调整、交通体系建设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能作的只是在掌握人口变动类型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使我们对于未来城市体系的格局得到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六、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区域发展决策的若干讨论

在基本实现人口转变和稳定低生育率以后,人口迁移成为影响长三角地区人口总量、分布和内在结构性变化的关键因素。长三角地区未来将继续保持人口的高度集聚和快速集聚,这对未来长三角都市群的发育和城市体系的结构变化都会产生长远影响。人口迁移将成为塑造未来长三角地区发展的主要人口力量,我们对人口迁移和区域发展的相关事务都需要引起充分的重视。

首先,应该立足于全国人口再分布的角度,在长三角地区实施以移民为导向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

长三角的国内移民是全国性人口再分布的组成部分。即人口由中西部地区向就业机会相对较多、资源和生态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迁移。未来一段时间,长三角地区每年的人口净增长可能会达到130万—140万。考虑到大量移民是持续地涌入城市并不断地返回农村的背景,实际年人口迁移和流动会更多。迁移是东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也对西部和农村地区人口收入增加发挥了积极效果。继续鼓励人口从西部向东部的迁移是一项有效的国家发展策略。

我国东部长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地区,适合采用迁移为主导的城市群发展战略。日本的东太平洋沿岸都市连绵带(东京—名古屋—大阪)可以给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实证的经验 and 有用的启迪。日本通过以城际轨道交通系统为依托,以东京为中心构造城市体系和产业网络体系,能够给长三角地区提供一个未来发展的参考模型。

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要实现人口迁移和区域可持续性的良好平衡。

虽然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群区域,但非流动性资源约束和资源获取的成本仍然会成为区域人口集聚的重要限制。长三角地区是一个矿物能源和矿物工业原料资源异常贫乏的地区,耕地不足,水质型缺水问题更加突出。同时,货物运输服务能力、交通设施服务能力等仍制约了长三角地区与上海对人口的高度集聚。人口高度集聚也使发展的风险日益集聚,包括能源供给的风险、突发事件的管理能力和应对能力的风险。同时,人口的增加会相应降低各种资源和服务的人均水平,从而降低区域发展的舒适程度和可持续性。

长三角地区需要在一个合适的规模下,用更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经济和社会进步,用更科学的区域规划实现城市体系建设和人口合理布局,用更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打造一个健康、可持续和蓬勃发展的长三角,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整体发展发挥作用。

第三,长三角地区要应对大量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推进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流动人口的多数在城市长期居留和稳定居留,工作方式长期化,居住方式常态化,生活模式家庭化,以及与城市体系发生更多的社会互动,这一切都要求采取以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政策。现行的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保险福利制度以及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还带来很大限制。对于日益增多的进城农民,不能再简单地采取堵、卡、赶等限制性措施,而要逐步按照同责任、同义务和同权利的原则,实现社会贡献和制度接纳的相互统一。因此,对长三角地区应率先推动以居住地为依托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也对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发展带

来挑战。尤其是在那些核心的迁入城市,急切地需要迁移管理的制度改革,探索推动对城乡二元体系的突破。

第四,长三角地区应通过更加综合的区域规划和区域协调机制,保证各个城市切合实际的发展策略和区域整体发展的共同实现。

长三角地区的不同城市应该采取差别性的发展策略,对于那些人口快速集聚城市、人口净减少的城市和处于转型期的人口微弱增长的城市,地方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确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

对于那些中心城市和新兴的大都市区,比如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来说,应当鼓励更为密集的城市组团发展,提高城市化的效率。上海已经显示出在长三角的领导地位,并且将通过强化创新能力和发展现代服务产业,来强化其在全球化中的枢纽性作用和区域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这些新兴城市组团应该在城市化建设用地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上获得更多的支持。

同时,即使是在发展如此快速的长三角地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口净减少的城市,比如南通、台州、扬州,这些城市大多位于长江的北岸。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与长江天堑的交通阻隔有一定联系。因此打通往江北的密集交通网络,特别是轨道交通体系是长三角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在此过程中将对长三角地区城市体系的结构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各个城市的发展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容易产生过度竞争、重复建设、产业发展分散的现象。因此,要努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规划和协调机制,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理想的区域发展既需要提高效率,即加强核心城市和主要都市

区的地位,也需要促进区域发展的内部平衡,增加对相对落后城市的支持,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而对于公平和效率的不一样的意见也往往影响着区域发展的政策和路径。

人口迁移、城市结构的演化及在此背景下的城市群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具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现实的发展往往不是人们所设计的发展,而是发展自身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未来面貌。人口迁移和区域城市结构的变化也与国际资本流动、产业结构及调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等众多复杂因素相互关联,这些力量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也将更深和更广地影响长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0) Replacement Migration: 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ing Populations
- [2] 沈君丽.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 南方人口, 2005 (1): 41-47
- [3] 任远, 王桂新. 常住人口迁移与上海城市发展[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5): 42-49
- [4] 朱宝树. 长三角就业迁移的人力资本差别效应和战略思考[A]. 谢玲丽等主编. 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C]. 2005
- [5] Newling Bruce Urban Growth and Spatial Structure: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66 (2): 213-225
- [6] Klassen L.H., et al.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M]. Aldershot: Gower, 1981. 8-28
- [7] Chan Pion. A Urbanization, suburbanization, counter-urbanization, and reurbanization. In Paddison R. and W. Lever (ed) 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M]. Sage, Beverly Hills, CA 2000
- [8] Hall P. The World Cities [M]. Heinemann, 1984

[责任编辑 王晓璐 傅 苏]

Forms of Internal Migration and Combined Effects on Regional Urban Struc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China

REN Yu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SDP)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makes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he basic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profile of population size, fertility transition, ageing, 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and concludes that mig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in YRD. The author describes two important forms of internal migration that includes the migration between outside YRD and inside YRD, and migrations among different cities within YRD. The author analyses how the combined migration process shape and change the urban structure.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l migration; Urban Specific Total Net Migration Rate (USINMR)